

主编 陈继征

中国 古代



文学 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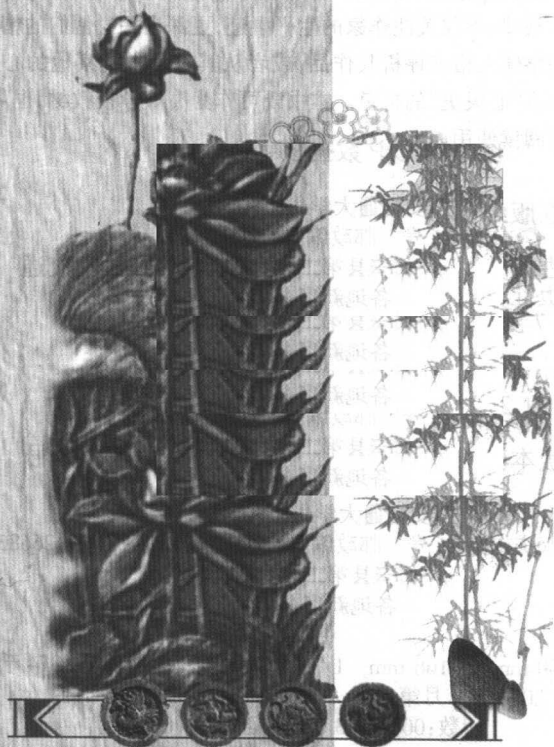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主编 陈继征

中国
古代

文学
简史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西安 ·

内 容 提 要

本书简明叙述上古至“五四”以前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程,包含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和清代文学等8章。本书既概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理清其发展脉络,又突出每一时代文学的特色和成就。对于重要文体、重要作家作品、重要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写得较为充分;一般内容,则采取略写,力求做到点面结合、点线一贯、简明系统。本书不仅叙述中国古代文学的事实和现象,更注意探究蕴含其中的民族精神和灵魂;不仅描述文学发展的一般过程,更注重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不仅关注作家的生平事迹,更深入探讨他们的精神世界,从把握作家的整体人格来评析其作品,或者从其作品中洞察他的心灵世界,因而使本书具有“心灵史”的特色。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教材,也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读者阅读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简史/陈继征主编. —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9
ISBN 7-5605-1443-X

I. 中… II. 陈… III. 文学史-中国-古代
IV. 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3498 号

*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兴庆南路 25 号 邮政编码:710049 电话:(029)2668315)
长安县第二印刷厂印装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15.125 字数:374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 1~3 000 定价:18.00 元

发行科电话:(029)2668357,2667874

导 论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之花,是人类心灵的歌唱。

文学史是艺术之树上的精神年轮,是人类鲜活的心灵史。

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悠久最辉煌的文学之一,其绵延不绝而又为世界所仅有。假如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视中国文学,它就像一条源远流长、奔流不息的七彩之河。追溯其源头,直如“黄河远上白云间”,那是一片浑茫迷离的境界;从上游向下游眺望,见它吸纳百川,千回百转,时而浪涛迭起,时而偶现低谷,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奔流到海不复回”。在这条文学的长河中,作家灿若群星,作品浩如烟海,名著杰构,美不胜收;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各放异彩,交相辉映;各种文学思潮,互相撞击,彼此渗透;各种文学现象,纷纭杂沓,交织互陈。然而正是这一切,反映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精神解放、心灵自由和审美愉悦的历程。现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和认识作如下概述。

—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它的载体是历史,它的内容是文学。文学史是以史载文,史笔文心。那么,编写文学史,既要有“史”的观念、“史”的系统和“史”的叙述语言,更要突出文学的主体地位,关注文学的特性和特殊规律。

“文学即人学”,这是一个含义深广而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命题,

它的确道出了文学的一些本质内涵。人是文学的创作主体,人又是文学表现的中心,人还是文学作品的接受和再创造者。文学活动自始至终须臾也离不开人,它是人的精神活动。文学固然要反映社会生活和客观事物,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写人。人是自然的主宰和社会的主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写了人,也就写了社会和自然。但是,描写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并不是文学的真正目的,它的真正目的是反映人和人的精神世界。黑格尔说:“诗特有的对象或题材不是太阳、森林、山水风景或人的外表形状如血液、脉络、筋肉之类,而是精神方面的旨趣。诗固然也诉诸感性观照,也进行生动鲜明的描写,但就是在这方面,诗也是一种精神活动,它只为提供内心观照而工作。……所以在全部事物之中,只有那些可以向精神活动提供动力或材料的才可以出现在诗里。”(《美学》第3卷第19页)这就是说,文学是一种精神活动,只有与人的精神相关的事物才可以进入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之所以描写自然景观和其他客观事物,是因为它们与人有关,映照了人的精神,符合了人的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如果自然景观和其他客观事物与人无关或不能映照人的心灵,那么,它们对于文学就是多余的,毫无意义的。所以黑格尔又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事物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出来。”(同上,第49页)

人是文学表现的中心,一切都是为了写人,反映人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文学即人学”的基本含义。但是,哲学、史学、艺术、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等不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学”吗?可见“文学即人学”只揭示了人文学科的共同性质,而未能揭示文学的特殊性质。那么,文学的特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在肯定“文学即人学”的前提下,还必须指出文学所特具的形象性、情感性和审美性。三性之中,又以情感性为精核。“吟咏性情,感荡心灵”,“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感是文学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的基因;而情感又是通过形象的和美感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文学当然反映思想,但却不是赤裸裸地抽象反映,而是包含在形象

中、融化在情感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融化在情感中,就像阳光充满水晶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辉。所以文学最本质的特征是鲜活的心灵性。

社会不断发展,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也在不断变化,文学的体裁、形式、技巧和语言也在不断地革新和演变。文学史就是文学反映时代精神和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事实上每一时代的文学总是反映着那一时代特有的社会生活和人文精神,表现出独具的艺术形态和特色。所以我们说,文学史是艺术之树上的人类精神的年轮,是人类鲜活的心灵史。

一部文学史要告诉人们什么?或者说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概括地说,就是叙述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程,理清文学发展的脉络;描述各个时代文学的不同状貌和特色;评价作家作品,总结艺术经验;阐释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总之,给读者以比较完整系统的文学史知识和正确的文学史观。但是,应该强调的是,文学史不能仅仅描述文学的史实及其发展的一般轨迹,而应展示深凝于文学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的灵魂。

文学史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十分丰富,而其主体则是文学,核心内容是文学发展演变的历程。文学史当然离不开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分析,然而这些背景分析必须紧紧围绕文学演变这个核心,阐释它们是怎样影响人情世态,形成一种时代精神,进而影响文学发展的。过去的有些文学史,往往是长篇大论地论述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最后才说到文学,并未能深刻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倒给人一种兜圈子、绕弯子的感觉,结果是隔靴搔痒,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抓住文学发展中的事实和现象,再探讨其原因,可能更为简捷。文学的发展演变,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重视外因分析的同时,更要重视内因即文学自身的承传演变,探讨文学是怎样在内外因交互作用中发展演变的。

既然“文学即人学”,是鲜活的心灵学,那么就应该从这个视角

探讨和阐述文学史。文学的发展演变,说到底还是人、人的精神和审美情趣的发展变化。作家是民族和时代的儿子,时代精神和传统文化在他的人生遭际中,共同造就了他那个人及其人格;他的人格又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作品就是他灵魂的外化,也是时代精神的独特反映。只有从文学是人的鲜活的心灵学这个视角切入,才能抓住文学史的根本,才能解释各种文学现象,更深刻地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但同时,也应多维度、全方位地阐述文学的发展演变。

文学史离不开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这是构成文学史的具体内容。对古代作家,不能只注意其外部事迹,更要探究事迹的源头——心灵世界和精神历程,从整体上把握作家的人格,进而去评析其作品,那就会深入底里。作家所有的创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灵流变和精神历程,在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凝结其中的灵魂和心态,从而可以看到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灵魂。我们洞悉了作家的心灵和精神历程,就打开了中国古代文学史深奥的窗口。在评价一个作家的艺术成就的时候,自然要看他对文学发展做出了多少独创性的贡献,看他的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但有些作品如山水诗、李商隐的无题诗,虽然并没有反映什么重大的问题,但却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愉悦,也应该给予恰当的评价。所以对作品的判断力和感悟力,也是文学史写作中不可缺少的。

二

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既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又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一般文学史都是依时间顺序按朝代划分,即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和清代文学。这样划分,并不是对史学分期的简单借用,而确实大体反映了中国文学发展阶段性的实际。文学的发展变化虽不以朝代的兴替而起止,但每一朝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生活都对文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形成了一代之文学。这一特点早已为人们所发现,如赵翼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王国维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自序》)这种“后世莫能继”的一代文学之盛,既是中国文学长河中涌起的一座座高峰,又是那一时代的主体文学,代表着那一时代的主要文学成就和特色,也成为中国文学发展阶段性的标志。下面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作一简要的概述。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孕育、发生和初步形成的时期,而原始文学则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先秦文学反映着远古时期特有的人文精神,具有雏文学的特征。在原始社会,人类面临着大自然的威胁,人们要为生存而斗争,所以原始文学表现出先民的生命意识。远古歌谣多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集体歌唱,形式简单而朴拙。古代神话是先民幻想的结晶,表现了他们征服自然的决心和愿望,带有浓厚的生命观烙印。这种朴素而自发的生命观,因其蒙昧而缺少对生命本质的清晰认识,又因其初发而具有天马行空的幻想。商代敬畏鬼神,盛行占卜祭祀,以巫文化为主。其卜辞、铭文是散文的萌芽,此后出现的《尚书》,标志着散文的形成。周代重德崇礼,强调固本保民,实行礼乐教化,更加关注社会人生。这种理性精神反映在文学上,表现为和谐典雅、婉而多讽的特征。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人们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探索宇宙人生,讨论安邦治国之道,进行哲理思辨,出现了成熟的诸子说理散文和记叙性历史散文,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特别是散文的传统。在诗歌方面,出现了我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和他创造的新诗体楚辞。这种新诗体,是《诗经》之后的又一座诗歌高峰。先秦文学呈现着雏文学的特征:一是文史哲不分,二是诗乐舞结合,表现出文化一体的混沌状态,还没有真正意

义上的纯文学。

秦汉文学,其实只是汉代文学。秦朝暴兴暴灭,时间短暂,更因其焚书坑儒,摧残文化,秦朝文学除李斯的《谏逐客书》和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汉朝是一个强盛的帝国,曾出现“文景之治”和武帝的赫赫功业,使士子折服乃至崇拜,心甘情愿地为其“润色鸿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消失,文人失去了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纷纷依附于皇帝与诸侯王,成为“语言侍从之臣”,形成以皇宫为中心的许多文人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和讽喻谏诤为旨归,创作出了铺张扬厉、繁富绚丽的大赋,这是汉赋形成的时代原因。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汉赋由楚辞演化而来,是诗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诗化。虽然汉赋被后代推为一代文学之盛,也反映了统一大帝国的繁荣强盛,但因其文胜质弱,缺少真情实感,故其生命力并不强。真正标志汉代最高文学成就的不是汉赋,而是散文中的《史记》和诗歌中的乐府。《史记》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以其清新活泼的五言形式脱颖而出,七言诗也在孕育之中,“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具特色、非常重要的时期。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表现出两大盛世间的过渡风貌,因而是一个风流独具的时代。一方面,长期动乱,南北分裂是其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又使魏晋六朝成为一个文采风流的时代,表现出独特的思想文化精神:关心政治、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崛起的个体意识,崇尚精神的自由;名士的佯狂傲世,返归自然的气质;抽象的思辨能力以及高雅的审美情趣。魏晋六朝文化在挣脱了两汉儒学独尊的文化模式之后,不仅为佛学的传播和道教的兴盛开拓出一片自由的天地,而且使崇尚自然、不拘名教的玄学得以产生和发展,并成为那一时代诸多思潮

的主流。这种思想文化精神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使魏晋南北朝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个文学上颇具异彩的时代。汉末三国,社会的动乱和灾难,曾激荡建安文人的心灵,写出了反映社会现实的苍凉悲壮、刚健清新的诗文,形成了有名的“建安风骨”。魏晋之际,一些返归自然的文人,以其恬静的心情歌咏田园山川之美,在题材和艺术两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和创造。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二谢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从而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田园山水诗派,对唐代的王孟诗派和此后的山水田园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陶渊明的人格与文格,更是后代文人追慕的楷模。嵇康、阮籍等人的诗文,则表现出愤世嫉俗、自视高洁的心态,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和放浪不羁的名士风度。第二,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此时的文人不仅把文学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倾其才力进行文学创作,而且已潜心研究文学的特性和创作规律,相继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龙》等文论著作,对此后的文学创作起了引导和推动作用。这是中国文学的第一次觉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三,魏晋南北朝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过渡时期。此时的文人有新的审美追求,在声韵和丽辞两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五、七言诗继两汉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律诗也已具雏形,为唐诗的兴盛繁荣准备了条件。

中国文学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诗歌、散文、小说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词和变文这两种新文体也已兴起。诗歌的成就尤其突出,是唐代的代表性文学。

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高峰。唐诗数量惊人,名家辈出,诸体皆备,流派众多,造诣极高。特别是盛唐诗坛,更是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既有高蹈归隐的王孟田园山水诗派,又有奔驰沙场的高岑边塞诗派,中间耸立着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这两座高峰,共同形成了盛唐气象。中唐诗人众多,风格鲜明,主要有两大诗派:一个是以元白为首的关注现实、风格

平易为特征的诗派；另一个是以韩孟为首的追求创新、雄奇险怪为特色的诗派。他们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晚唐诗坛有些萧索，成就不大，但依然出现了李商隐和杜牧等优秀诗人。李商隐善写人的心灵，其诗深情绵渺，精玫瑰丽，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杜牧的诗峭拔俊逸，清新朗畅，颇具特色。

散文在唐代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韩愈和柳宗元不仅倡导了古文运动，而且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改变了当时的文风。韩文雄壮奔放，汪洋恣肆；柳文清新秀美，幽默多讽。他们的革新和实践，使散文更具有文学性。此外，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成熟。

造成唐代文学全面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代特别是盛唐，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们充满了自信和乐观的精神，整个社会弥漫着诗意的浪漫的气息。唐代文化灿烂，思想活跃，促进了不同风格、流派的形成。加上统治者对文学的重视和提倡，科举以诗文取士，激发了士子乃至社会各界对诗歌的爱好和崇尚，作诗吟诗，蔚然成风。此外，唐诗的发展繁荣还取决于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到了唐代，诗歌创作已积累了近两千年的艺术经验，特别是魏晋六朝，在诗体、声律、语言和技巧等方面，为唐诗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所有这些，共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宋代文学是在唐代文学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却开辟出了新的文学天地，取得了异于唐人的卓越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的散文继承和发展了唐代散文的优良传统，而其成就却超过了唐代散文。“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出自宋代，而且还有一大批散文名家，作家队伍远比唐代庞大。宋代散文无论内容、形式、语言、风格，都比唐代有新的开拓。其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更具有抒情性和文学意味，具有诗的意境，成为名符其实的美文。

宋代诗歌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唐诗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宋代

诗人另辟蹊径,力求创新。一是拓宽诗的题材,描写平凡事物和日常生活。二是在美学境界上化俗为雅,以平淡为美。三是以理趣取胜,以新奇夺人。相比而言,唐诗重意兴,宋诗重神理;唐诗丰腴,宋诗瘦劲;唐诗蕴藉,宋诗深刻;唐诗通脱,宋诗曲折。于是宋诗标新立异,风韵遗世。

宋代文学的最大成就还是宋词。词这种新诗体经过中唐至五代的发展成长,到了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举其大者,既有以柳永、李清照为首的婉约派,又有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前者缠绵悱恻,委婉含蓄;后者奔放飘逸,壮浪恣肆。宋词诸体完备,题材广泛;声律精湛,技艺纯熟;章法句式,严格规范,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宋词作为一代文学之胜,堪与唐诗媲美。

到了元代,中国文学起了划时代的变化,这就是叙事性的俗文学的兴起,并且逐步成为文坛的主体文学,而传统的正宗诗文却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一发展趋势,到明清两代势头更加强劲。

元代的代表性文学是元曲(戏曲和散曲),特别是杂剧,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崇高地位。元代前期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杂剧作家和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与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相比毫不逊色,他们却比莎士比亚早三百多年!元代后期戏曲的中心移向南方,逐渐演变成了异于北方杂剧的南戏。最著名的作品有《琵琶记》、《拜月亭》等。散曲是元代兴起的新诗体,它既可以像诗词那样抒情写景,又是杂剧的组成部分(曲词),它比诗词更通俗流畅,生动活泼。散曲的作家大都是杂剧的作家。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的〔越调·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最为著名。

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在明清两代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小说,达到了全盛的时期。“明清小说”像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成为时代标志性的文学话语。明初出现了《三国演义》、

《水浒传》，中后期又出现了《西游记》和《金瓶梅》，世称四大奇书。清代又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名著，特别是《红楼梦》，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在戏曲方面，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共同创造了传奇的辉煌。

三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一个十分复杂且有些微妙的问题，至今还处于不断探讨的过程中。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既有外因——经济、政治、文化等，又有内因——文学体裁、形式、语言、技巧等，是外因与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即时代发展的需要和文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互动作用形成的必然趋势。事实上二者是不可分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说。

文学的发展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文学是水，经济、政治、文化等是土、石、山，是地势是河床。去高就下地流动是水的本性，而地势和河床又制约着水的流向和缓急。文学的发展必然受到经、政、文的影响和制约，但影响的程度和情形却不相同。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是潜在的远距离的和间接的，就是说它不能对文学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而必须通过某种媒介如思想、道德、世情等，才能对文学发生影响。例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并没有立即出现文学的繁荣；但到了“开元盛世”，当社会出现全面繁荣而影响人的精神生活的时候，文学便出现了“盛唐气象”。特别是明代中叶，由于工商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市民意识的兴起，促进了俗文学的发展与兴盛。

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更直接，冲击力更大。历史上的朝代兴替、社会动乱以及统治者对文学的态度和政策，都对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唐代的安史之乱，在某种意义上说，造就了伟大现实

主义诗人杜甫及其“史诗”。宋代重文轻武,“守内虚外”,边患不断,加之理学盛行,所以宋代文学充满了忧患意识、政治色彩和议论色彩。文人士大夫依附朝廷,高官厚禄,征歌逐酒,浅斟低唱,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是促进宋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纷纷走向市井,直接推动了元杂剧的兴盛。他们那种文士与平民的双重身分,形成了失落与不甘、自卑又自尊的矛盾心态,所以其杂剧作品中,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喜笑怒骂的笔锋,对世事揭露、批判、讽刺、诅咒,表现出元曲作家独特的个性和时代精神。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图存、改良变法成为文学的主题,而文学也成为改良的工具,小说等俗文学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和重视。

文化与文学最为密切,它对文学的浸润和影响更直接更恒久。儒、释、道三家对中国文学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儒、道两家,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儒家注重道德和人格的修养,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因而在文学上表现为现实主义精神;道家体任自然,崇尚精神自由和心灵愉悦,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因而表现出浪漫主义精神。佛家主张四大皆空,心如明镜,追求空灵静美的艺术境界。李白世称“诗仙”,颇受道家的影响;杜甫世称“诗圣”,终生事奉儒术;王维皈依佛家,隐居山林,世称“诗佛”。仅此三例,即可见儒、释、道对文学的深刻影响。此外,文化中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对文学的熏染与浸润也不可忽视。盛唐文化的灿烂与文学的繁荣关系十分密切。

经济、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各有侧重,且程度、情形不同,却不是一一分别地影响,而是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合力,从而影响社会生活和世情人心,即形成一种时代精神,然后才对文学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就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以上是对文学发展的外因的分析,下面再对文学发展的内因进行探讨。

深入分析中国古代文学自身演变的过程,我们发现以下带有规律性的几点:

第一,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开端,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孕育或发生于这一时期。远古歌谣是诗歌的滥觞,而形成于《诗经》和楚词。卜辞、铭文是散文的萌芽,形成于《尚书》、《春秋》,成熟于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古代神话则孕育了小说的胚胎。诗乐舞结合则是戏曲的雏形。

先秦文学带有母文学的性质,它不只是中国文学的“宝库”,也是它的土壤。古代神话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那种不畏艰险,不畏强暴,追求光明,锲而不舍的精神,而且它的丰富奇妙的幻想也为后代文学所汲取,甚至神话本身也成为后世作家的创作题材。《诗经》和楚辞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流派,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对后世诗歌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秦散文被后世作家视为楷模,历次的古文运动都是以它为号召,历代的散文家、小说家和戏曲家,几乎无不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

第二,中华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而又以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为主流。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也呈现着这样的特征。中国文学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诗经》可以作为它的代表;长江文学发生较晚,是为楚文学,楚辞是其代表。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不同以及世情民风的差异,黄河文学和长江文学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黄河文学多现实主义精神,慷慨激昂之气,刚健质朴之风;长江文学多浪漫主义精神,富于奇思幻想,风格绮媚婉丽而多讽。例如《诗经》和楚辞,《孟子》与《庄子》,南朝民歌与北朝民歌,元杂剧和南戏等。然而在长期的互相交融和影响中,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气魄和作风。

第三,几乎每一种文学,都首先由民间产生,而后为文人接受,经过他们加工、整理和创作而成为正式的文学。所以中国文学大

都经历了由口头到书面,由俗到雅,由粗到精的发展历程。例如,《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十五国风,本是民间的口头歌唱,经过乐官的搜集整理,再经过孔子的增删修饰,才成为精美的文学作品。楚辞也是在江南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屈原作了天才的创造。词由民间的曲子词发展而来,元散曲由北方民歌演化而成。戏曲的形成比较复杂,但它首先形成于勾栏瓦舍中的说唱艺人。小说本出于街谈巷议,民间传说,而由文人加工创造而成。就连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也都是在民间传说、说唱文学基础上的天才创造。可以说,由民间到文人,由口头到书面,由俗到雅,由粗到精,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

第四,各种文体形成和成熟的时间不同,有早有晚。诗文产生和成熟的最早,并且作为传统文学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小说虽然萌生于古代神话,但经过数千年的孕育培养,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初具规模,到了唐代中期才真正成熟,而到明清才发展到顶峰,并成为主体文学。戏曲形成的最晚。宋代以前,虽然有各种“戏曲”形式不断出现,但算不上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戏曲,它像是发育迟缓不够健全的婴儿。到了宋金之际,出现了宋杂剧和金院本,才标志着戏曲的形成,而到了元代,戏曲的发展才达到了高峰。文学史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出于两种原因:一是各种文体的构成因素有简有繁,写作有难有易,所以发展有速有迟,形成有早有晚。相对而言,小说、戏曲要比诗歌、散文复杂,写作难度也大,所以发展就迟缓,成熟也就晚。二是取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文以记事,诗以抒情,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和精神的需要,而统治者又把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把诗歌作为教化的工具,把诗文确立为正宗,所以诗文发展迅速,成熟最早。小说、戏剧是俗文学,被统治者视为“雕虫小技”,不能登大雅之堂,长期处于被轻视、被排斥的地位,所以它们发展慢,成熟晚。到了宋元之后,商业发达,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俗文学小说、戏曲才应运而生,兴旺发达。

第五,各种文体间的渗透与交融,会产生新的文体或形成新的风格,从而促进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新文体、新形式,总是在旧文体、旧形式的基础上演化嬗变而来的。五言诗由四言发展而来,七言诗由五言和杂言发展而来,律诗由古体诗发展演化而来。赋是诗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诗化,是诗文杂交而成的一种新文体。魏晋时期散文受辞赋的影响而形成骈文。文体的交融,有时会出现新的文学风格。例如韩愈以诗为文,使散文诗化,首创文学散文。苏轼以诗为词,使词诗化,世称诗词;周邦彦以赋为词,使词赋化,称为赋词;辛弃疾以文为词,使词散文化,称为文词。这都有力地促进了宋词的发展和繁荣。此外,中国各种文体都有诗化的倾向。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诗具有很强的渗透力,举凡散文、小说、戏曲等无不有诗化的倾向。这种诗化的倾向,使文学作品更具有情感的浓度和诗意美,从而增强了艺术魅力。

第六,文学的革新,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动力。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魏晋南北朝文学走上了自觉的道路,注重文学的审美情趣,研究声韵、丽词和技巧,第一次使文学从文化中独立起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这本来是有革新意义的,但到了六朝,由于过分追求声色,又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出现了文胜质弱、浮艳华靡的文风。这种文风一直延续到唐初,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发展。陈子昂举起诗歌革新的大旗,疾呼恢复汉魏风骨,摈弃六朝文风,促成了声色与性情的统一,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廓清了道路,迎来了盛唐诗歌的繁荣。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又发起古文运动,提倡先秦两汉古文,反对流行已久的六朝骈文;主张文道合一,“文从字顺”,建立新的文体和文学语言。经过他们的提倡和创作,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要地位。但到了晚唐,古文一度衰落,骈文重新兴起;到北宋初期,西昆体盛行,形式主义复炽。欧阳修等再次发起古文运动。这次由于采取了批判地继承的正确做法,又有王安石、三苏一批大作家的积极参与,势大力沉,不仅确立了古文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把散